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常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关键词:明清文学;关中;“秦风”;时间空间理论;文学环境;文学风气;文学体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1-0020-07

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运用时间、空间理论的思想资源对文学进行研究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但运用当代文学的新范式,尤其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则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新维度。文学环境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总和,广义的环境就是文学的系统性。对明清关中文学环境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明清关中的文学环境相对而言比较封闭,且绝大多数士人对“秦风”有着心理上的偏好,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这一偏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自清初以后,关中士人的文学取向逐渐多元,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梳理,管蠡之见,求教方家。

一、本地文学环境的封闭性

社会交往构成了士人社会生活的主体部分,“谈论社会生活,就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1]。而士人的交往是在具体的时空和具体的人物之间所

进行的。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生产的理论中,对空间问题曾表述说:作为社会关系生产的空间会对处于其中的个体进行界定,左右着他的心态与行为,同样,处于特定空间中的人也会通过对于空间的感知来表达自己的存在状态^[2]。从文学与空间的关系角度来理解,特定区域具体生产实践活动对文学的发展和影响是具体和现实的,并由此产生与特定区域相适应的心态,从而生发通过空间感知来表达个体欲望的要求,文学作品就是这种表达欲望的最高级形式。文化的空间同物理空间有所区别,那就是强调生活空间内人们的实践性和流动性,而这一切同交通状况有直接关系。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中讲到:“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3]交通与文学空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文学空间的生产和延续必须借助交通进行资源补给与交换,尤其是创作主体的流动与配给。

相较现代,传统社会交通落后、通信不发达、大众传媒缺失,大多数人终生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作家通过间接交流来了解和认识世界的空

收稿日期:2014-0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ZXW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K5051308001)

作者简介:常新(1971-),男,甘肃靖远人,教授,历史学博士。

间极为有限,他们对家乡之外广阔世界的认识,固然需要借助“读万卷书”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行万里路”的亲身体验来完成,因此由交通条件所导致的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达的城市,尤其是作为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往往也是交通枢纽或中心,它虽然不一定是出产作家最多的地方,但却是群英荟萃、作家群居之地。首都作为一国政治活动的中枢,其地址的选择必须考虑自然地理和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的优势。

在宋金对峙期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政治势力的角逐,南北文化交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北方流行的是苏东坡一系的学术,“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4]。而北方的统治者“完颜一朝,立国浅陋。金宋分界,习尚不同”^[5]。《宋诗纪事本末》中“北方诸儒条”记载了当时的境况:

理宗嘉熙二年(戊戌,一二三八)冬十月,蒙古姚枢建太极书院于燕京。初,蒙古破许州,得金军资库使姚枢,时北廷无汉人士大夫,太祖见之甚喜,特加重焉。及阔端南侵,俾枢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枢招致稍众。及拔德安,得赵复,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既被获,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枢止于共宿,譬说百端,曰:“徒死无益,随吾而北,可保无他也。”复从之,枢于是获觐周、程理性之书。至是,惟中与枢谋建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子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度者为道学生,繇是河朔始知道学。

宝佑三年(乙卯,一二五五)二月,蒙古忽必烈征许衡为京兆提学……是时,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县皆建学,民之大化^[6]。

黄宗羲等认为:“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7]元人袁桷也曾对宋金对立时期的北方学术与诗文有过概括,其《真定安敬仲墓表》说:“金蹂宋逾南,两帝并立,废道德性命之说,以辩博长雄为辞章,发扬称述,率皆诞漫丛杂,理偏而气豪。”^[8]学风呈现“诞漫丛杂”之态,其说虽然带有某些偏见,但对我们思考元初北方学术与诗文发展的背景和基础,还是有所帮助的。在忽必烈中统建元以前,北方“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才”^[9]。经历元末战火洗劫后,明初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10]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绝少有不外出旅行和漫游的人。中国古代的纪游诗词、纪游散文之发达,亦堪称世界之最。“游道广泛”被看作是声望和地位得立的条件之一,也是被称道的美谈,即便是高官显宦也视交游为急务。王世贞著作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锦职贡之会莫敢后至”^[11]。外出游学和旅游,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江南地区相比尚有相当差距,因此士人出游的整体水平较低,地域之间的流动性不强,文学环境相对封闭。有条件出游的士人大致分为客游、求学、仕宦、从军等。另外,经济利益的驱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士人由外邑向京城流动,由经济欠发达甚至落后的边远地区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流动,从而造就了明清关中士人地域流动的同向性和密集性特点。因此京城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是关中流动士人的聚居地,这些出游的士人或商人成为关中和外界沟通的主力,通过对关中有文学成就的士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属于上述情形。

二、文学的风气与接受

在任何时代,文学接受都绝不仅仅仰仗于朝廷的文化政策,也不仅仅依赖文人的思想宣传,更重要的是借助传统文化因素和各种社会传播方式。

王水照先生指出:“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最显著的。”^[12]这一问题在《史记》和《汉书》中已有表述。《史记·货殖列传》云:“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悞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13]涉及文艺的风格与风土民俗的关系。较之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更应引起文学史论家的重视。班固不仅以关中为例更加深入细致地描述了风俗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豳,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鄠,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岛膏腴^[14]。

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是双向的,地理环境影响文学家,形成文学家特定的生活经验、文化积累、生命意识、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在元、明时期,当北方文化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偏向于接受北方文学传统;当南方文化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偏向于接受南方文学传统;当南方文学传统和北方文学传统处于交流混融状态的时候,人们则偏向于接受南方文学传统,涵容北方文学传统^[15]。这些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经过积累,便形成地域性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地理学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言其地分”、“条其风俗”成为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并将之与圣人的学统联系起来^[16]。“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4]“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7] 综上可见,“风”是指因气候、地理、水土、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俗”是指由社会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习惯、规范和品行等。两者相加即为风俗,它是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像一面镜子,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特征。

文化消费对文学文体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作家、读者、文本传播等因素来实现的。消费改变了作家群体和作家生活方式、读者群体和阅读方式、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当这些构成文体选择与文体发展的因素都发生着不期而然的变化时,文体本身也就必然发生变化。关中地区经济在靖康之后陷于凋零,民众生活处于困顿状态。郑刚中曾在南宋绍兴年己未,以秘书少监预参谋由临安府经河洛进入关中,至潼关看到“山河之壮,俯视他关,独城内芜废”^[18],发现关中居民多以土洞居之避乱,“今之陕西遗民,多是土洞中生”^[18]。而明末的大饥荒与明清之际的战争,给关中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税减,耕地荒废。据康熙六年编纂的《陕西通志》卷九《贡赋》统计,康熙初年的耕地较万历时减少四分之一^[19],由于明代关中地区经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基层士人仍以耕读传家为主。由于经济实力的整体差异,与江南地区相比,关中地区保留了中世纪文人相

对封闭、半耕半读的传统,在各种现存的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描述颇多。“士勤诗书,代不乏人。屏绝浮屠,不事工贾”,“永寿人性愚戆,工事惟吏稍识去就,其余莫能知也。士多兼农,择师远游者鲜。农勤作,苦甘淡泊。贫者力佣自资,作奸者少,百工不尚技巧,作无用独椎鲁,不能商贩,故里少素封。同时,士人保留着淳朴敦厚”,“永俗士敦礼让,守《诗》、《书》,农无闲工,亦少余粟。工极拙一无长技,器极质,率多楷窳,商惟麻缕菽麦铜铁瓦缶,以资民用。妇女粗解缝纫,不嫖纺织”^[20]。长武县“士人接见,其语言质实,服饰鲜华。丧葬虽从时而情文不敝,馈享虽薄,物而恭敬有加,祭祀燕饗间其不苟有如此,且民勤稼穡,力田之余鲜末作也。士崇孝友,诵读而外绝奔营也,有淳古澹泊之风,而乏挽近侈靡之习”^[21]。就文学的表现而言,关中地区也显得质朴,“山国之地,土地硗瘠,阻于交通,故民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直至“清代中叶,北方之士,咸朴僿蹇冗,质略无文”。而相对开放的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治骈文者,一以摘句寻章为主,以蔓衍炫俗,或流为诙谐;以稚威、容甫(汪中)为最精。若夫诗歌一体,或崇声律,或尚修辞,或矜风调,派别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22]。就文学的表现而言,北方之士也显得质朴。

文学作品提供的是一个“意义世界”,文学接受就是接受作品所传递的“意义”。接受主体的接受能力具有选择性,文学接受者的素质、心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学接受的过程与效果。“对于接受本身来说,当然应该充分地高扬审美性的欣赏或鉴赏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有意识地顾及准审美性或非审美性的诸多反应现象”^[23],这些非审美的反应涉及文学的风气、土壤等因素。

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理论一般注重鉴赏、品评、释义的文学接受方式,文学接受主体的作家群体对文学的文体、内容、审美等都具有趋同的特征。诗歌接受活动中,文学接受者们还总结出“观诗”、“用诗”和“说诗”这样一些独特理论内涵和文化内涵的文学接受方法和接受模式。

文学接受主体的地域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到清初,关中士人重视文道和喜好笃实文风的传统被完全保留,时人以“朴实君子”视之^[24]，“其诗本风骚,在诗学接受方面由于受地域文化影响,遵从七子的诗学主张,在其《钮玉樵明府

诗集序》中曾回忆少时接受七子诗学的景象:“予方弱冠,结交皆老苍,时诸公论诗,竞斥钟、谭,左袒中原七子。七子主声调,似近盛唐。”^[25]其诗“出入古歌谣乐府,而以少陵为宗”^[26]。同时,明清关中士人对文学的接受同他们“变流靡”为复古运动的目标相一致,与关中士人“质实”论的观点相一致,也与他们对关学思想的持守相一致。翻阅《关学编》、《关中两朝文钞》、《关中两朝诗钞》可以发现关中理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当时文学界的名宿。在传统文学史中,由于康海具有一定的文学成就,其理学家的本来面目被掩盖,其实他一直倾心于有道之文,且与当时关学中坚人物保持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薛瑄、吕柟、马理是关学在明代复兴过程中的中坚人物,“明兴百七十二年,其以道明天下,盖惟三四人而已。河东薛先生德温,涇野吕先生仲木(吕柟)与先生”^[27]。康海同他们都保持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伯循(马理)骨肉生死者,仲木及仆二人耳”^[27]。在其所著的《浚川文集序》和《送瀾川子序》中都显示出他对重道之文的重视和接受,“夫言者心之声,文者言之章也。士自始学以及于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无着也”^[27]。“于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绘什奚传焉,抉奇穷瑰奚传焉,侈溢泛浩、宏博伟大奚关焉。”^[27]康海对浮丽文风的批判同关学笃实的学渊相一致。马理“少从王恕游,务为笃实之学”,偏好秦汉之文,“文喜《尚书》,似夏侯湛昆弟诰之体,涂饰雕刻。其为贗古,视梦阳又甚焉”^[28],主张文以实为贵,“若雕藻缋,玄习竞巧,君子奚取焉”^[29]。至清初,关学殿军人物李颀说:“盖必有先于诗文者矣。砥德砺行,养深蓄厚,故见之诗文,犹有源之水,千流万派时出而无穷,浑浩雅健,极作者之致,兼众体,成一家,其言近,其旨远,粹然一出于正。观者流连爱慕,是诗文以人而重也。……由是,而诗为有本之诗,文为有本之文,人重而诗文亦重矣。”^[30]

三、文学体裁的传统性

作为文学作品形式因素之一的体裁是指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文学的体裁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土壤和人们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西方不尽相同,文体分类的传统也很不一样。在中国,最早产生并得到充分发展的是诗歌,而后产生散文,小说、戏剧产生得较晚。西方一般把文体分为抒情、叙事、戏剧3类,西方文体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曾讲

到:“假如用同样的媒介模仿同样的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让人物说话;可以始终不变,用一个人的口吻叙述下去;也可以使模仿者用动作和活动来模仿。”^[31]这是西方最早的对文体进行三分法的范例。中国古人侧重于从文学作品的结构体制、语言特点、表现样式等方面来进行分类:最早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将诗、词、歌、赋等讲究节奏韵律的作品归入韵文,而将神话、传说、寓言、论说、游记、书信、小说等无此讲究的作品归入散文。以上诸多文体大致可以归结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4类。这4类文学体裁中小说和诗歌植根于商业社会比较发达、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有相当社会民众基础的江南地区,关中地区的小说和戏曲,尤其是小说在明清关中士人的文学作品中较为罕见,戏曲在曲目的数量、在民众中的普及性等方面也不逮江南,此处姑且不论。就诗歌和散文而言,明清关中士人的文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传统性的特征。

关中士人对秦地有一种本然的亲近感:“雍之文肇于伏羲,闡于文武,周公。《易》源也,《诗》、《书》、《礼》、《乐》流也,逮秦焚坑,文几熄矣,至宋而有张子《西铭》,文斯续焉。《三百篇》多出于岐、丰,汉苏、李变为五言,唐李、杜加以七言,虽非风雅颂之基,然亦赋比兴之阶也。汉诗曰苏、李,唐诗曰李、杜,触物兴怀,出骚入雅,不愧《三百篇》,雍之文不有余响乎!”^[32]诗歌方面秉承“先秦两汉之风”,薛应旗在谈到关中风声、习气与文学关系时更是明确指出:“关中风声习气,淳厚閎伟,刚毅强奋,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汉以降,其所谓豪杰者,大都欲以古文辞名世,故至于今。”^[33]就诗歌方面而言,继承汉唐雄浑大气的风格,而不像江南地区那样文学流派异彩纷呈,何良俊在谈到这一点时也指出:“南人喜读书,西北诸公则但凭其迅往之气,便足雄盖一时。”^[34]以李梦阳为主的复古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关中“有古之道”的复兴,“古文”和“古道”在这次活动中有重合之处,黄省曾在致李梦阳的信中指出:“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哉!圣代鸿泽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岳秀,凤彩星华,乃钟萃于先生,由此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扬,鄙音弥国而黄钟特奏,至勇不摇,大智不惑,灵珠早握,天池独运,主张风雅,深诣堂室,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咸闻风翕然而新变,实乃先生倡兴之力,回澜障倾何其雄也。”^[35]黄省曾的观点和元好问、薛应旗对关中士人“风气”的看法完全一致,这也是明代文学复古何以兴起,何以以关中士人为首的原因。

李梦阳在文学复古运动中“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6],李梦阳提倡此论,其矛头指向当时萎弱卑冗的文风,主张通过学习古代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来达到振兴明代文坛的目的。“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37]“古学渐兴”即学习六经之风气,李梦阳的诗歌复古在明代复古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学习古代文化思想的学习风气。李梦阳守法最严,他的诗歌虽然带有过于模拟的弊病,但毕竟也因此而不失古典诗歌的本来面目。康海等以带有关中地域文化色彩的“太史公质直之气”和“先秦两汉之风”^[27],反对成化以前及南人纤靡之失,他同薛应旗一样也谈到“关中风声气习”问题,在其《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中说:“予览传记之所载,关中风声气习,淳厚閎伟,刚毅强奋,有古之道也。”^[27]所谓“关中风声气习,淳厚閎伟,刚毅强奋”,就是北方诗歌“重乎气质”所特有的情感力量和真挚朴厚。康海“好马迁之史,入对大廷,文制古辩,元老宿儒见而惊服”^[38]。王维祯诗歌重视法度与格调,极力推崇杜诗,力求以严谨有度的体格和章法来铺陈情理,以简古的笔法,创作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王允宁生平所推服者,独杜少陵。其所好谈说,以为独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贵有照应,有开阖,有关键,有顿挫,其意主兴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诗一二有之耳,不必尽然。予谓允宁释杜诗如朱子注《中庸》一经,支离圣贤之言,束缚小乘律,都无禅解”^[39]。到了清初,关中的士人坚持这一传统,李因笃言:“关中北地崛起,含宫吐角,其乐府骎骎汉人矣。近钱侍郎受之,顾摘其字句而微疵,至低之以秦声,不曰关中丰镐旧几,二雅之遗音俱存,而诗十五国风如召,如王、如郑、如魏、如幽,皆在邦域之中,不独秦也。”^[25]

简古崇实、沉厚雅健是关中士人质朴厚实的人格特质,这一人格特质在散文中所体现出的特色就是对“质实”语言的运用,它符合关中朴实厚重的文化和顿本好修的学风。李梦阳“少壮时,振翻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36],主张“文贵约而该,约则览者易遍,该则首末弗遗”^[37]。李梦阳为文质实的精神同他崇尚《左传》、《战国策》以至《尚书》的句法章法相一致。康海一直致力于对浮丽文风的批判,“《左》氏、《国语》,一时之言,其精粗虽异,而大指无谬于事实,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学不求诸其心,徒以言语文字之细贸贸焉,终日以为道在是矣,亦不远乎?”^[27]这

也体现出康海在文章复古主张上反对靡丽,同时强调文道关系中的相依性。

四、“秦风”与“婉丽清雅”

就整体而言,文学的发展总是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士人的流动和生存的境遇总是能够带来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某种变化。

关中地区所系秦汉风土,以“淳厚閎伟,刚毅奋强”之气在明代中期文学中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使“秦风”为士人所推崇,但随着文学复古中的关中士人由于“刘瑾事件”后退出京畿,“秦风”也就难挽颓势,尽管有“后七子”中李攀龙等人的鼓吹,但风光不再,后来的关中士人尽管对“秦风”执着坚守,但随着士人生存境遇的变化,诗风的取向逐渐多元化。

考察“前七子”中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的活动范围,可以看出三者执着于“秦风”的原因。康海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在关中地区度过。弘治十二年己未,时年康海25岁,“举进士不第,与予游国子”^[27],弘治十五年,时年康海28岁,康海为进士及第第一。到正德五年庚午,时年康海36岁,康海由于“刘瑾伏诛”而被劾罢。这8年时间他绝大多数是在京城度过的,被罢黜后,康海曾南游江南,“予曩游南都,睹太学之所积”^[27],只是时间很短。李梦阳和王九思有着和康海大致相同的经历。由于生活地域的狭小,导致文学交流受限,对士人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会导致士人的文学创作无论风格还是体裁都难有较大突破,晚年的康海和王九思在散曲上继承元曲本色,间作南曲,但风格仍近北曲,这也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三人整体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关中士人群体中,有部分由于仕宦和流寓的原因在江南生活时间较长,这部分人在文学创作上受江南文风的影响较深,文学创作兼有江南文学委婉迤逦的风格。杨鸾为乾隆四年进士,历官四川犍为,湖南醴陵、长沙、邵阳,“学诗于屈复,初仿西昆,晚益瑰丽苍桑,极中晚之胜”^[40]。李念慈宦途不顺,流域江南多年,其诗兼南北风格,施闰章在《谷口山房诗集旧序》中言:“(李念慈)自秦之晋,南游江淮,所遇山川风物,寄怀属性,情随景移,蔚焉蒸变,其逆旅无聊不平之作,盖兼秦风而兼乎吴楚者耶。”^[41]相较杨鸾和李念慈,流寓江南的金銓更是

“吴音化”。金銓“随父宦侨居建康,遂家焉”,“习歌诗,诗不操秦声,风流婉转,得江左清华之致”^[11]。

同一作家在不同的场景中聚合其身的文学元素也自然不同,随着作家对生活体验的变化,其情绪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变化往往体现在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由于政治原因,明清关中士人生存境遇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原动荡,许多士人远离政治的漩涡,通过山居或乡居来缓解精神的痛楚。山间的静穆、乡村的风情成为安顿他们疲惫身心的栖息地,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情随景移”,士人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体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雄健奔放的“秦声”为典雅婉丽的诗风所代替,追求一种淡雅的致德之境。关于李柏的诗风,《清朝野史大观》卷九记:“雪木所著《榭叶集》冷艳峭刻,如其为人。”^[42]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中记:“诗文皆极险怪通峭。盖伤心故国。歌哭行吟,通天入地,以寄其悲愤无穷之感。”^[43]李柏的诗,作法的确独特,但以“冷艳峭刻”评之却未见中肯。王心敬在《墓碣》中言:“盖生平最爱者渊明,故焚渊明之诗,嚼咀尤熟,不知不觉风韵逼真耳。”^[44]我们从李柏的许多诗作中可以感受其山水诗清新流丽和简单古朴的艺术风格,李柏山水诗的这种平淡、清美风格的产生与其气质、人生的态度及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关,同时还跟诗人物象、意境的创造相一致,他所反映的是一种遗世而独立的生命意趣,一种与世俗纷扰相对立的超脱境界,一种尚清远浊、全性葆真的品格特征^[45-50]。

五、结 语

总之,明清关中文学中“秦风”是《诗经》中“秦风”的流风余韵,士人对“秦风”的偏好致使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典型性的一种风格,对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随着文化的交流和士人流动性的扩大,明清关中士人在继承“秦风”的基础上汲取江南地区文学创作风格,呈现出文学创作风格的多元化,暗合了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使关中地域性文学成为一种开放的文学样态。

参考文献:

- [1] 彼得·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李国武,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2]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3] 严望耕. 唐代交通图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4] 翁方纲. 石州诗话[M]. 陈迥冬, 点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 吴梅. 吴梅词学通论·吴梅中国戏曲概论[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
- [6]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7] 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 袁桷. 清容居士集·真定安敬仲墓表[O]. 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 [9] 佚名. 庙学典礼[M]. 王颀,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10] 胡广. 明太祖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1]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2] 王水照.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J]. 文学遗产, 1994(3): 74-83.
- [1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5] 尚学锋, 过常宝, 郭英德. 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16] 杨义. 文学地理学会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17] 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8] 郑刚中. 西征道里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9] 田培栋. 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 [20] 郑得枢, 赵奇龄. 永寿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 [21] 沈锡荣, 王锡章. 长武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9.
- [22] 童庆炳. 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经典[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3] 童庆炳. 文学理论要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24] 吴光西, 郭麟, 周梁. 陆陇其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5] 李因笃. 受祺堂文集[O]. 关中书院道光七年刻本.
- [26] 李因笃. 受祺堂诗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27] 康海. 康对山先生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8]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9] 马理. 溪田文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30] 李颀. 二曲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31] 亚里士多德, 贺拉斯. 诗学·诗艺[M]. 罗念生, 杨周

- 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32] 马汝骥.西玄诗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3] 薛应旗.方山先生文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5]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6]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7] 李梦阳.空同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 [38] 崔铣.洄词[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9] 王世贞.文苑卮言校注[M].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
- [40] 佚名.清史列传[M].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1] 李念慈.谷口山房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42]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1981.
- [43]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44] 李柏.榭叶集[O].清刻本.
- [45] 常新.李柏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及其逻辑结构[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12(2):55-58.
- [46] 常新.《老子》研究的优秀之作:读《<老子>文本与道儒关系演变研究》[J].管子学刊,2011(1):127-128.
- [47] 常新.儒家道德及其审美境界[J].伦理学研究,2011(4):27-31.
- [48] 常新.“孔颜之乐”与“曾点之志”:李二曲道德人格的境界问题[J].船山学刊,2011(4):77-81.
- [49] 常新.“博文约礼”与“知性”:论李二曲下学上达的工夫论[J].船山学刊,2013(3):90-94.
- [50] 常新.叙事的艺术与艺术的叙事:对原始彩陶审美意象的民族学考察[J].黑龙江民族论丛,2009(3):122-126.

Literature environment of Guanzho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Qin style”

CH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Due to easter transfer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 literature of Guanzho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not as prosper a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lack of geographical advantage in Guanzhong area and the relatively closed literary environment affected literary creation vigour but l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 The “Qin style” of Guanzhong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a reflection of relatively closed literature environment. The writers’ preference for “Qin sty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came weaker with time, and the choices of literary styles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zhong; “Qin style”; time space theory; literary environment; literary ethos; literary genre

